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授课教师**余博闻 副教授（[bowenyu@fudan.edu.cn](mailto:bowenyu@fudan.edu.cn)）

**目录**

[第一讲 导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位与价值 3](#_Toc192086717)

[一、回顾国际关系学 3](#_Toc192086718)

[（一）国际关系与生活 3](#_Toc192086719)

[（二）国际关系学主要问题 3](#_Toc192086720)

[二、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 3](#_Toc192086721)

[三、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与功能 4](#_Toc192086722)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 4](#_Toc192086723)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 4](#_Toc192086724)

[（三）如何开展理论分析 5](#_Toc192086725)

[（四）如何评价理论 5](#_Toc192086726)

[（五）理论分析之外 5](#_Toc192086727)

[第二讲 古典文献 6](#_Toc192086728)

[一、 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6](#_Toc192086729)

[（一）历史背景 6](#_Toc192086730)

[（二）斯巴达辩论与战争的原因 7](#_Toc192086731)

[（三）米洛斯对话：正义v. s.强权 7](#_Toc192086732)

[（四）为什么国际关系学应当停止误用“修昔底德陷阱” 8](#_Toc192086733)

[二、马基雅维利与权力政治理论 8](#_Toc192086734)

[（一）《君主论》中的人性论 8](#_Toc192086735)

[（二）《君主论》中的治国方略 8](#_Toc192086736)

[（三）马基雅维利理论中的“美德”“命运”“必需” 9](#_Toc192086737)

[三、霍布斯论自然状态和利维坦 10](#_Toc192086738)

[（一）人性、环境与自然状态 10](#_Toc192086739)

[（二）利维坦诞生的必然性 11](#_Toc192086740)

[（三）霍布斯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11](#_Toc192086741)

[四、康德与永久和平论 11](#_Toc192086742)

[（一）《永久和平方案》 11](#_Toc192086743)

[（二）迈向永久和平的终极机制 11](#_Toc192086744)

[（三）康德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12](#_Toc192086745)

[第三讲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关理论发展的“大辩论”和“范式演进”叙事 12](#_Toc192086746)

[一、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 12](#_Toc192086747)

[（一）理想主义产生的背景 12](#_Toc192086748)

[（二）理想主义的要义 12](#_Toc192086749)

[二、卡尔与《二十年危机》 14](#_Toc192086750)

[（一）卡尔对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批判 14](#_Toc192086751)

[（二）卡尔的国际政治观 14](#_Toc192086752)

[三、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和外交方略 15](#_Toc192086753)

[（一）汉斯·摩根索与现实主义六原则 15](#_Toc192086754)

[（二）汉斯·摩根索论国家行为和均势 15](#_Toc192086755)

[（三）汉斯·摩根索论外交方略 16](#_Toc192086756)

[四、国关理论发展的“大辩论”和“范式更替”叙事 16](#_Toc192086757)

[（一）“大辩论”叙事概览 16](#_Toc192086758)

[（二）“大辩论”的价值 17](#_Toc192086759)

[（三）反对“大辩论”叙事的理由 17](#_Toc192086760)

[（四）关于范式（paradigm） 17](#_Toc192086761)

第一讲 导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位与价值

2025.2.19

一、回顾国际关系学

（一）国际关系与生活

当代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将近二百年前，清朝被拉入了世界格局；如今，世界格局的每个细节依然与中国息息相关：中东的局势与美国全球战略的焦点紧密相连，进而影响美国针对中国的亚太战略；2000年代中期G20峰会上的决定影响了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也为之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埋下伏笔。个人的命运也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只要一个人要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不论是生活、旅行、求学、消费、工作，都与国家命运、人类命运紧密绑定。

总而言之，全球体系十分复杂，各部分相互影响，紧密相关；国际关系牵动着个人的命运；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是多元的，国家仍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但非国行为体家（如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等）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国际关系不仅涉及大国的兴衰，还关乎制度、规范等“软件”的设计、建构与运行。

（二）国际关系学主要问题

国际关系是一门研究国际政治各行为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内行为体〔官僚、地方政府等〕、个人等）之间的互动的学科。具体地说，国际关系关注战争与和平、秩序与控制、解释国家的国际行为、解释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创立的初衷，秩序与控制则是当代的热门话题。国际关系解释国家行为的范畴不只是战争与和平，还包括为何合作、遵守制度、遵守规范等，甚至国家国内变革与国家对外行为，国家对外行为与国内变革等；解释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则是上一点的延伸，但目前还尚未成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贯穿国际关系学的始终，是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大框架。

二、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

为了考察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我们不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国、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选取疫情作为例子，是因为疫情甚至比战争更能调动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

如果运用现实主义框架，那么关注点就在于国家的反应。无政府状态、生存作为第一目标、权力零和博弈等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初期试图落井下石”“为什么存在疫苗民族主义”一类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疫苗制备能力并非顶尖、但依然要制造大量疫苗——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受制于人，即使是技术上或经济上不甚合理的决策，都会出于现实因素而作出。

如果运用制度主义框架，那么就同样关注国家的反应。国际体系的复合相互依赖既能促进合作，又具有脆弱性，例如新冠肺炎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问题；国际制度与国家间合作息息相关，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协调功能等。国家合作的限度也值得考虑。从制度主义视角来看，疫情封控的结束也是必然的，因为“人口流动”的制度因素无法消弭。

除此之外，还有领导人特质因素（如疫情初期特朗普的决策风格）、国内因素（如国内利益集团在其中的利益）也可作为进一步的解释变量。

当然，上述因素以外，国际关系中还存在一些“软因素”，如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认知因素等。

三、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与功能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

1. 理论，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是试图分析、解释或预测事物的一个命题或一组命题。因此，**国际关系理论**被定义为一套用于分析世界事件和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和指导方针。

理论是对现象的系统思考，旨在解释这些现象，并说明它们如何以一种有意义的模式相互关联，而不是不连贯的随机现象。总之，**理论**是一套命题和概念，旨在通过明确命题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现象。通俗来说，理论所揭示的就是“什么因素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什么结果”。

不同的科学哲学流派对“何为理论”的回答也有所不同。实证主义认为，理论是经过实证检验的假设系统，或通过实证观察得出的概括系统；科学实在论认为，理论解释了一般趋势，即由基本机制产生的变量之间反复出现的联系；规范主义认为，理论是对世界“应该如何”的想象；批判理论认为，理论批判了现有秩序，同时提供了变革和解放的视角。

2. 理论与规律的区别

规律是现象、行为或变量之间的固有关系——“如果A，那么就B。”例如，日出日落乃自然的规律。

理论不仅涉及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还涉及这些关系为何存在和重复。理论可以解释规律——例如，日出日落是因为地球的自转与公转而产生的。

规律是恒久、绝对而正确的，但理论并非如此。例如，“日出日落”是恒久正确的，但“地心说”“日心说”作为理论先后被证伪了。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

理论的功能包括：

* 理论定义重要问题；
* 理论指出哪些应为分析要点，为解释现象提供分析的捷径；
* 理论具有一定的洞察力；
* 理论提供一种看待现实的独特视角
* 理论为改变世界提供指南。

但是，理论就像地图或手册，无法涵盖所有细节，只是根据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来提供抽象的指南。某一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理论总是被假设和解释范围所限制。研究者要自行决定哪一（或哪些）理论在何种情境下提供了最优解。

理论的建构有两种途径：一是归纳（induction），二是演绎（deduction）。

国际关系理论的要素有：

* 如何理解人性？
* 如何理解国际体系的状态？国际体系对国际行为体行为有何影响？
* 如何理解国家（拟人化？复杂性？）？如何理解国家利益？
* 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有何影响？
* 哪些因素影响了领导人（或集团）的决策？个人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如何？
* 如何理解权力、制度与观念要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
* 如何理解变化（何为变化？变化的动力？）

（三）如何开展理论分析

开展理论分析的基本步骤如下：

* 决定研究的性质：一般性研究、普遍性研究；
* 对研究问题的充分认识：问题处于哪个层次？对细节如何取舍？既有的解释有何不足？
* 初步理论选择/建构：你对各种因素和基本过程的最佳猜测；可检验的假设；
* 验证你的理论解释：关联性是否存在？过程、机制是否存在？实证发现的普适性？
* 反思、修正、必要时重启：做好假设被推翻的准备。

（四）如何评价理论

评价理论的指标包括：

* 一致性；
* 广度与深度；
* 解释力；
* 未来发展的预期（预测）；
* 自我批判与竞争性理论比较；
* 洞见。

教授认为，“可证伪”性不必放在这里；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大多数体系理论都是坏理论。

（五）理论分析之外

除了理论分析之外，还有其他几种分析方法：

|  |  |  |
| --- | --- | --- |
| **分析方法** | **解释** | **案例** |
| 历史学叙述 | 为描述和/或研究单个或多个案例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在可获得信息和写作篇幅等客观约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般追求尽可能详尽地还原现象发生的所有（重要的）细节。 | 加迪斯v.s.阿利森  保罗肯尼迪  修昔底德作为特殊案例 |
| 哲学分析 | 哲学分析从核心文本和分析性思维中提出理由；哲学方法可能无助于帮助我们回答具体问题，不会帮助我们制定或实施政策，但它们可能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提供规范性指导。 | 柏拉图  霍布斯  康德 |
| 批判性分析 | 批判性分析对主要概念进行解构，并利用话语分析进行深入描述。 | 女性主义、后现代  （广义上也可归为理论分析） |
| 相关性分析 | 相关性分析利用统计数据发现一般模式；有观点认为，数据和方法压倒了他们的研究实质；行为主义者忽视了许多基础性问题——人类和社会的本质，因为这些问题不容易用实证方法来检验。 | 关于“民主和平”的实证研究 |

第二讲 古典文献

2025.2.26

许多后世的人在引述古典文献时，往往只是引用一个“名”，对古典文献中的概念作粗浅的理解，生搬硬套——例如，“修昔底德陷阱”的提法就有待商榷。因此，阅读古典文献本身就显得很重要。

**阅读古典文献能获得启示。**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无不从过去的经典著作中汲取营养。许多现代理论都是基于理论家对过去理论的一种解读（很多时候也是误读）。比如，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为现实主义提供基础，他们本身也得益于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康德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提供基础。国际关系学确实非常善于借鉴和重构概念和分析框架，以为国际政治分析服务。

**阅读古典文献能锻炼思维。**经典文献往往思想深邃复杂。越研读越能获得启示，越研究越能发现隐藏在逻辑和文本细节中的惊人之见。因此，解读本身可被视为一种思维操练，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纯粹的追求真知，非常有趣。

**阅读古典文献能增长知识。**从追求知识的角度，多读历史和经典也是有好处的，能够增加我们的人文底蕴。

1. 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一）历史背景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受了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影响，但他更在意“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真正的因果关系”，远远比希罗多德深刻；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除了史学意味外，更有一层政治哲学的意味。

修昔底德旨在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古希腊世界而言是以悲剧而结尾的；也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要目的在于反思战争。在这本书中，演说辞至关重要，占全书的1/4篇幅。

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修昔底德

但这不一定是正确的，修昔底德可能刻意使两边观点交锋，从而展示反思。这就是为什么这不是一般的历史书。

（二）斯巴达辩论与战争的原因

科林斯人演讲的主旨是将雅典描绘成傲慢、蛮横、侵略成性、追求无限扩张的国家；威胁（若斯巴达不予援助）将脱离斯巴达主导的同盟。

雅典人演讲中则有：

* **目的：**对斯巴达表达威慑；
* **要点一：**雅典帝国源自盟邦对雅典领导地位的拥戴和自愿接受；
* **要点二：**雅典的行为是自然和正常的，因为其遵从了人行为的三大动机——恐惧、荣誉心和私利欲望；
* **要点三：**任何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无论其霸权如何正当和温和，必然成为众怨所指；因而，假如斯巴达毁了雅典帝国，它也不会给其他国家自由，必将像雅典一样失去盟邦的好感；
* **要点四：**斯巴达应当三思而后行，战争有其难以预计性。

对斯巴达人内部辩论的常见解读（也是来自修昔底德的直接陈述）是：

斯巴达人所以表决确定和约已被撕毁和他们必须投入战争，不是因为他们被其盟友的论辩说服，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希腊的较大部分已在雅典人手里，害怕雅典人可能变得更加强大。

——修昔底德

这里就有“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不合理的一点：“修昔底德陷阱”认为是崛起国导致了与守成国的战争；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却是守成国雅典发动了对崛起国斯巴达的战争。

总之，结合科林斯人的说辞，以及当时雅典军舰的四处出征，斯巴达就将其理解为了雅典的侵略，这一认知既已生成。

科林斯人对斯巴达改变政策起的作用可以被分成三方面：**第一，**他们组织和促成了一场有效的、由斯巴达的哀怨的朋友和盟邦掀起的宣传运动，那给了好战的斯巴达监督官们一个机会，来在最有利的环境中抛出自己的主战理由。**其次，**他们运用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即威胁脱离斯巴达同盟，那看来会引起该同盟的解体。我们可以将此威胁当作只是虚声恫吓，但大多数斯巴达人不愿拿它试试看。**然而，**科林斯人运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大概是他们给他们的斯巴达观众绘制的那幅雅典人画像。靠着将雅典帝国的早先历史与雅典最近对科尔基拉问题的回应绑在一起，他们能够将雅典人描绘成一种轻率躁动、咄咄逼人和危险无比的人民，它必须在为时过晚以前被制止。

——唐纳德·卡根

由此可见，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不能被简单解释为“权力转移”，而有着多重的原因。

（三）米洛斯对话：正义v. s.强权

米洛斯是一个反抗雅典侵略、最终招致灭亡的城邦。雅典人的理论中，有着权力政治的内核：

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面对雅典的侵略，米洛斯以正义予以驳斥；但在雅典的“自然之理”中，恐惧、荣誉、私利才是核心。然而，雅典帝国基于爱戴，因此雅典还是要在道义上找到正当性。

在米洛斯与雅典的争论之后，雅典就走上了下坡路。这印证了米洛斯对雅典的忠告：没有帝国可以靠强权永久维系；叛变是杀不尽的。总之，这其中体现了强权政治的限度，也体现了强权政治的悲剧——雅典帝国（甚至整个希腊文明）走向衰亡正是由于帝国抛弃了正义的传统，完全倒向了强权和扩张。

米洛斯必须被毁灭，因为米洛斯是雅典人理论的例外。

（四）为什么国际关系学应当停止误用“修昔底德陷阱”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当代国际关系学解释为现实主义的“修昔底德陷阱”，但这本书的原意却是“纯粹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除了现实主义外还有正义与荣誉”。

国际关系学对修昔底德的借用包括：

* 关于人的三大动机的论断启发霍布斯和后来的IR学者；
* 从米洛斯对话中总结的权力政治逻辑；
* 从开战原因分析引出结构现实主义和权力转移理论论稳定与冲突（如吉尔平）。

其中被主流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忽视或曲解的智慧有：

* 雅典是崛起国？（回到“修昔底德陷阱”）
* 纯粹的文本借用v. s.修昔底德想要讲的智慧；
* 现实主义理论将导致悲剧的权力政治逻辑视为了正常的逻辑？
* 正义、传统、话语的重要性？
* 荣誉的重要性？
* 傲慢、误判、自我实现的预言与战争。

二、马基雅维利与权力政治理论

（一）《君主论》中的人性论

《君主论》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恶”。

如果天下皆君子，这种劝诫就不是忠言了，但世人奸诈，不会对你守信用，所以你也不必充当君子。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君主论》中给予“人性恶”而提出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也对后续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基础。

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至诸脑后，那明天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自我毁灭。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二）《君主论》中的治国方略

《君主论》指出，国君之责任在于为国家谋利益、谋生存，如同狮子与狐狸一般，综合运用力量与欺骗。军事力量至关重要：

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和声誉了。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君主可以为了利益违背道德（如欺骗）。做一个“出色的伪君子”。

让人畏惧以及不招人怨恨，这两者是可以很好地并存的。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人们爱戴君主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畏惧君主则是出于对方的意愿。英明的君主应该把统治建立在自己的意愿上，而不是以其他人的意志为转移。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三）马基雅维利理论中的“美德”“命运”“必需”

马基雅维利作为个人道德高尚的代表，为何要在治国理政上提出如此不符个人道德的方针？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割据势力十分严重，各城邦国家间的彼此仇视使意大利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因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备受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蹂躏。马基亚维利主张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结束意大利的分立状态。

1494年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共和国。1498年马基亚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会见过许多执掌政权的人物，成为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亚维利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率领军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509年比萨投降佛罗伦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的矛盾中，他到处出使游说，力图使其和解，避免将佛罗伦萨拖入战争，并加强武装以图自卫。但当他1511年前往比萨时，教皇的军队攻陷佛罗伦萨，废黜执政官，美第奇家族重新控制佛罗伦萨。马基亚维利丧失了一切职务。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国家理由”观念与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

面对四分五裂、战乱不止的意大利，依凭个人道德显然是没有出路的。马基雅维利于是提出了他理论中的美德（Virtù）、命运（Fortuna）、必需（Necessità）。

“美德”包含着公民的德行与统治阶级的德行；它既意味着一个人随时为公益作奉献的准备，也意味着国家伟大创立者和统治者的智慧、精力和抱负。不过，马基雅维利将一国的创立者和统治者所必须具有的“美德”算作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德”。如果君主按照基督教的个人美德行事，是对整个国家的不负责。

他确信，即使是共和国，若无伟大的统治者、组织者个人襄助，也无法问世。因而，在此限度内，他的共和理想含有君主主义倾向。

“命运”是恶毒的，“美德”在别无他法时，也必须恶毒。这很明白地表达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真正精神来源，那就是如下声名狼藉的信条：在国家的行为中，甚至肮脏的手段也是有理的，只要关系到赢得或维持国家所必须的权势。

说《君主论》就其技巧性的各章而言，很容易使人感到马基雅维利只是在密切关注君主的个人利益。但如果将这一作品同《论李维》和他的其他著述一起拿来当作一个整体看待，那么这种印象就完全消失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真正的中心思想，那就是凭借一位专制君主的“美德”，凭借“必需”所规定的一切措施的杠杆力，来实现一个沦落了的民族的新生。

当问题在于拯救祖国时，一个人不应当有丝毫迟疑去考虑某事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是文雅的还是残酷的，是值得赞美的还是可耻的。相反，他应当抛开一切别的想法，把无论何种将拯救国家生命和维持其自由的决心坚决贯彻到底。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三、霍布斯论自然状态和利维坦

在1649年，英国人结束了自1642年由处决国王并宣告英国为共和国而开始的内战，仍在巴黎流亡的霍布斯感到他必须回应一系列革命性事件，所以他停下手头工作，着手写作《利维坦》。该书出版于1651年，就在霍布斯返回英国前不久。

（一）人性、环境与自然状态

《利维坦》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的演说为主的文本，以及《君主论》这样教条为主的文本都不同，它是以严密的演绎推理为主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能力的平等性。

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第二，欲望的平等性。

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第三，资源的有限性加上平等的欲望，就导致了竞争与疑惧。

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他们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由于人们这样互相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能够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第四，对荣誉的追求。

每一个人都希望共处的人对他的评价和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相同。每当他遇到轻视或被过低评价时，他自然就会敢于力图尽自己的胆量加害于人（在没有公共权力使大家平安相处的地方，这足以使他们彼此摧毁），强迫轻视者对他做较高的评价，并且以杀一儆百的方式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同样的东西。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根据这一切，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就处于所谓自然状态，也就是战争状态下。

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战争不仅存在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时期……正如同恶劣气候的性质不在于一两阵暴雨，而在于一连许多天里下雨的倾向那样，战争的性质也不在于实际的战斗，而在于整个没有和平保障的时期里人所共知的战斗意图。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下，任何中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将不存在。

（二）利维坦诞生的必然性

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还有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利维坦通过支配社会，剥夺人的自由来给予安全。

（三）霍布斯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在国际关系中，“自然状态”被广为引用，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概念化；其对人性的理解也被广为引用。但霍布斯对人性和自然状态的理解远远比结构现实主义所呈现的更复杂。

霍布斯所推理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各国显然不是平等的。此外，国家也不像个人那样脆弱，因而恐惧不会那么大，从而国家很可能不会放弃权利，而是加强权力；所以，世界政府就不大可能存在。

四、康德与永久和平论

（一）《永久和平方案》

康德《永久和平方案》之要点，就在于设想根本超越国际无政府与其固有的“战争状态”效应，办法是皆为自由主义性质的国内政治改造和国际体制构建。康德认为，共和政体是自由、平等、所有人服从法律的政体；自由国家的联盟则是共和政体的国际延伸。

这里，必须留意“共和制”和“民主制”在此特定语境中的含义。康德，就像大多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一样，认为在民主制中人民自己行使执行权（executive power），因此人民永远是自己的事情的法官，显然，这是不合理的。根据当时的通行理解，共和制是指立法权和执行权彼此分离（不管执行权是转交给一个人还是许多人）政体，它实质上是今天所习用的“代议民主制”。简单来说，“共和制”指的是权力制衡，而“民主制”指的是多数统治。

（二）迈向永久和平的终极机制

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看似是一个“一步到位”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在实际上，这一方案也有其现实意义，也并非当下就能实现，需要社会的演化（evolution）。

康德的激进主义，就在于设想根本超越国际无政府与其固有的“战争状态”效应，办法是皆为自由主义性质的国内政治改造和国际体制构建。然而，对于实现这一超越，康德的终极信心或真正希望何在？说到底，那不在于共和制度的普遍化，甚至也不在于抽象的理性，因为康德对现实主义者们描绘和确信的悲观图景完全承认，完全理解，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个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大为不同的悲观主义者。必须从他的《世界史》（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来看问题：他的终极信心或真正希望在于世界史的逐渐演进，尽管是很大程度上不可知的演进。“自然设计与人的道德义务命令的趋同——那从它们之间的冲突当中兴起的趋同，是在他的《世界史》中得到阐说的那种新颖的历史概念的本质，据此历史是朝着一个目的的分阶段发展的逐步演进。”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不那么是一位自由制度主义者，他超出了本质上没有历史哲学的自由主义。

——时殷弘《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原稿）》

在康德的道德观中，人不会理所当然地“变好”，但他们都有从经验中获取教训、进行适应的能力。因此，永久和平的进程，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进步。从这一点可以推出，之所以不要常备军，是为了“全民上战场”，通过战争的苦痛经验来总结出和平的重要性。

（三）康德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从表面上来看，康德是自由主义的基础（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所称的“自由和平论”）。但是，如果考虑到康德关于社会演进的论点，那么康德更是建构主义的基础（关键在于社会的演进）。

第三讲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关理论发展的“大辩论”和“范式演进”叙事

2025.3.5

一、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

（一）理想主义产生的背景

从时间顺序上来说，理想主义可谓“第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的产生背景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背景基本一致，都是在一战后为了理解、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出现的。

国际关系的兴起源于一场灾难性的大战；支配和激励这门新科学的先驱们的压倒性目标是避免国际政治体制的这一**疾病**再次发生。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一战带来了巨大的消耗与杀伤，以及“没有意义的牺牲”，暴露了欧洲传统权力平衡游戏的缺陷，未能维护和平。

（二）理想主义的要义

1.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1.废除秘密外交；2.航行自由；3.自由贸易；4.国际裁军；5.协调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利益；6-13.具体政治安排；14.成立国联。

威尔逊宣告，美国的参战目的“是在世界生活中确立正义与和平的原则，反对自私和专制的强权，是在世界真正自由和自治的民族中间确立目的和行动的一种协调，它将从此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这些原则总的来说，在于从一套与传统的欧洲权势政治观相反的国际关系理念出发，要求废止传统的国际政治运行模式，改行实际上体现美利坚民族特殊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念体系（说到底还有其特殊利益抱负）的新规范和新机制，以此实现从未被欧洲列强当作政策目的的普遍持久和平。

威尔逊主义致力于寻找消除战争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

* 消除国家冲突的领域和战争的能力；
* 促进民主与自决；
* 依赖大众舆论和启蒙来弘扬正义、自由；
* 以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替代均势。

从十四点计划的第1、5条可见，威尔逊强调战争起因于专制制度，因为据称只有在这类制度下，一小撮统治者或特权阶层才能肆意为自己的狭隘私利发动战争，驱使民众充当炮灰。在威尔逊那里，普遍持久和平首先有赖于普遍确立民主制度，使据认为生性热爱和平的大众主宰国家对外政策。在他现实政策中，这就体现为不愿和俄国结盟、要求德皇退位等。

从十四点计划的第2、3、4条可见，威尔逊认为国家利益可以调和。普遍持久和平还有赖于用自由贸易原则支配国际经济关系，其必要条件包括公海绝对自由和尽可能消除一切歧视性贸易安排和其他经济壁垒。

从十四点计划的第14条可见，威尔逊认为可以限制国家。

但是，这十四条的提出并没有达成其预期。这些条款只描绘了应然的国际社会状态，缺乏对达成理想状态所必须的政治机制的分析和认识。

2. 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

传统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于1943年出版《有效的和平制度》一书，提出功能主义方法。简单来说，功能主义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废除国家的存在”。功能主义主张从“低政治”的维度（如体育、科研等）做起，通过这些方面的合作，逐渐拆解国家功能，形成新的跨国网络，最终废除国家，实现和平。在功能主义的愿景中，个人最终是忠诚于跨国网络而非国家的。

传统功能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仅从“低政治”的领域出发，而没有考虑“高政治”的领域；并且，那些“低政治”的领域，实际上还是具有政治化的；这些方面的合作也涉及资源分配，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国家的政治功能。

新功能主义对传统功能主义作了修正和完善。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提出，对政治性与功能性作绝对的截然划分是不对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是难以分割的”，“经济与政治、政治家和专家的截然区分并不存在，因为技术化的决策基于一个先行的政治性决定”。

由此，新功能主义对经济或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向政治性领域作了相对的区分，认为两者既具有适度的分离，又有内在的联系，从而奠定了从功能性领域向政治性领域扩溢（spillover）的基础。

“扩溢”指的是，不同领域的合作具有潜在的关联性，任何领域合作的成功都会增强在其它领域进行合作的愿望与信心。

政治统合是一个进程，通过这一进程几个处在不同国家环境中的政治行为体被说服将其忠诚、期望与政治行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该中心的机构拥有或要求拥有对现有民族国家的管辖权。

——厄恩斯特·哈斯

3. 理想主义论点总结

理想主义对人性的预期是相对乐观的，认为人性是理性、可以进步的，可以通过教育和环境改善而变好。

理想主义认为民族自决会导向民意下的民主；国家间的利益是可调和的。冲突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舆论可以促进国家间和平的合作，从而构建和平的世界；国际和平应当依托集体安全体系。

理想主义之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相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国际体系能够被改造成一种完全和平正义的世界秩序，相信觉醒后的民主主义意识将产生巨大影响，相信国际主义会有越来越多的呼应，相信国联一定能够发展和成功，相信进步人土的和平努力和启蒙工作能够奏效；理想主义者坚信自已作为国际关系学者的职责，是消除愚味和偏见，揭示通往和平安宁之路”。

——王逸舟

二、卡尔与《二十年危机》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是外交官，1919年作为英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参加巴黎和会，后来又在英国外交部工作；1936年，他任教威尔士大学。卡尔是一名历史学家，这是他的主业。1939年，他撰写了《二十年危机》，不久之后就爆发了二战。

（一）卡尔对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批判

卡尔认为，理想主义以“应然研究”代替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导致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理想主义将“道德”绝对化，但个人尺度的道德与国家道德有很大不同，国家追求本国利益可能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可能做出按个人道德标准违反道德的事；理想主义过度强调国家利益和谐论，但实际上国家利益是相冲突的；理想主义片面强调国际法、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的作用。

（二）卡尔的国际政治观

卡尔的国际政治观以权力为核心。他的观点以命题为主，给出世界观，多数是基于历史洞见而非假设；缺乏解释和推理。

卡尔认为，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成分（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三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卡尔受马克思主义“物质基础决定意识”的思维方式影响，认为国际政治现象可用权力进行解释，所谓的利益和谐论不过是反映了现状国的利益。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权力可以是手段，也可以是目的。

卡尔认为，权力与道德是政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两者相互影响，当然权力起决定作用。

在战争与和平的原因的问题上，卡尔强调权力的制约。他认为战争与和平是背后是维持现状国家与改变现状国家的权力斗争；维持现状国家权力占优则和平，改变现状国家权力占优则战争。因此，在一战后的二十年之间，关键不是改造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而是以权力制衡防止那些国家东山再起。

三、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和外交方略

（一）汉斯·摩根索与现实主义六原则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是：

1. 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2. 理解国际政治的关键是由权力界定的利益；
3. 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但特定的利益观念并非一成不变；
4. 不能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来评价国家的行为；
5. 拒绝把特定国家的道德愿望上升为普天下适用的道德法则；
6. 现实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策对国家权力有何影响。

对于第1点，摩根索认为，人性本能是追求权力（自私自利，并非邪恶，而是与霍布斯差不多），国家是人的放大。在研究方法层面，这一点意味着，社会的客观规律不能轻易改变，我们要做的是顺应规律。

对于第2点，摩根索认为，权力是手段，也是目的。政治领域中，当谈到对利益的追求时，实际指的是对“权力”的追求。这与用财富界定利益的经济学等学科有本质的不同。

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

——汉斯·摩根索

对于第3点，摩根索认为，国家行为逻辑统一于追求权力，从而可以分析历史，可以比较分析。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什么样的利益决定政治行为，要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

——汉斯·摩根索

摩根索的第4点原则是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那里获得启发的。对于第5点，摩根索认为，所有国家在诱惑下都会用“适用于全世界的道德目标来掩饰它们自己的特殊愿望和行动”——这就像十字军东征式的狂热，以“道德原则、理想或上帝”之名，实际毁灭了众多的民族和文明，这在道德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要防止以道德之名推行民族主义。

摩根索比卡尔有更严谨的推理逻辑，但摩根索也并未区分国家和个人层次，简单基于人性推论国家行为逻辑。在摩根索的理论中，国际体系的意义也不清楚（或至少未被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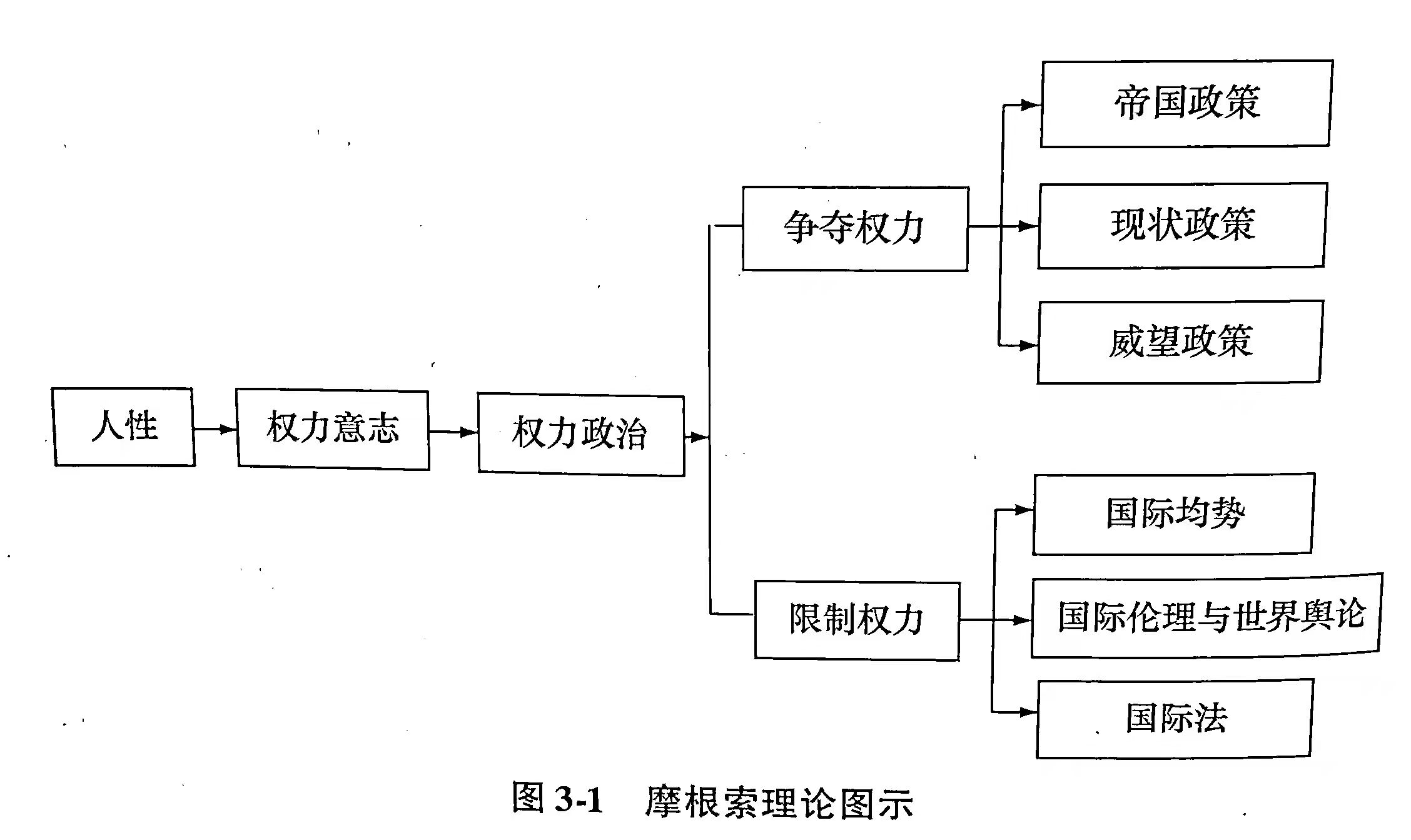
（二）汉斯·摩根索论国家行为和均势

摩根索认为，国家的对外行为可被概括为三类：维持现状的权力（保持权力、保持政策）、帝国主义的扩张权力（增加权力、增加政策）、威望显示权力（显示权力、威望政策）。

摩根索指出，“均势”既可以理解为多个力量彼此制约而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也可以指旨在寻求这种态势出现的政策；均势不是一种体系，而是落实于个体所执行的外交之上的。均势基于国家间的权力争夺，但通过建构对均势原则的国际共识带来和平。

维持均势需要巧妙的外交。在摩根索看来，在各种均势中，多极均势更为灵活。大国数量越多，可能的联盟数目就越多，联盟的不确定性就越大。而联盟的这种不可靠性使得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在国际政治的棋局上慎重举步，以尽可能减少贸然的改变带来的巨大风险，从而保证了多极均势的相对稳定。

摩根索的理论结构总体如下图所示：



（三）汉斯·摩根索论外交方略

摩根索指出了外交的四大任务：

1. 按照本国可用的实际力量和潜在力量确定对外政策目的；
2. 估计别国的对外政策目的，连同别国可用于追求这些目的的实际力量和潜在力量；
3. 确定这些不同的对外政策目的在什么程度上是可以互相兼容和共存的；
4. 运用适宜的手段来追求本国的对外政策目的：（1）说服；（2）有取有予的妥协；（3）武力威胁。

摩根索还提出了外交的四条基本规则：

1. 外交必须舍弃意识形态狂热或“征服精神（Crusading spirit）”；
2. 对外政策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和国家能力来确定；
3. 必须理解别国的国家利益，理解别国的安全需要；
4. 必须愿意在并非至关紧要的一切问题上做出妥协。

对于“妥协”，摩根索提出了实现外交妥协的五项前提条件：

1. 为获得真正的、实质性的好处而放弃空洞的、无价值的权利表象；
2. 永远不要使本国处于要么后退丧失威望、要么前进大冒风险的境地；
3. 不要让弱小的盟国左右本国的决定，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盟国的根本利益当作本国的根本利益；
4. 武装部队是对外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它的主宰；
5. 政府是公众舆论的领导，而不是公众舆论的奴隶。

四、国关理论发展的“大辩论”和“范式更替”叙事

（一）“大辩论”叙事概览

在“大辩论”叙事中，一共有四次大辩论。

第一次大辩论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大辩论，也是本讲的主要内容；这场大辩论开始于一战，结束于大概60年代。

第二次大辩论是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大辩论。行为主义强调一种科学实证的方法论，即研究人的行为模式，这是基于自然科学的思路的；这种思路沿用到社会科学，就以量化、理论模型化和精简化为主要标志。第二次大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方法论的辩论，而不是一场理论的辩论。

第三次大辩论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大辩论。

第四次大辩论是范式之间的辩论，可以理解为各自理论在各自的范围内展开辩论。

（二）“大辩论”的价值

斯蒂芬·瓦尔特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囊括当代世界政治的所有复杂性；因此，我们最好有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而不是单一的正统理论；理论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揭示理论的优缺点，促进后续完善，同时揭示传统智慧的缺陷。

（三）反对“大辩论”叙事的理由

包括教授在内的一些观点反对“大辩论”叙事，这些观点认为：

* 第一次大辩论被过度简化；
* 第二次大辩论根本不是具体理论间的辩论（而是关于如何建构理论、建构何种理论的辨论）；
* 第三、四次大辩论叙事转向中层理论，但忽视了太多其他理论（比如国内、个人层次理论），且这也并非以范式为界的辩论。

（四）关于范式（paradigm）

1. 何为范式

范式是一个分析学派所采用的基本假定、概念以及命题之系统陈述。范式提供根本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

有观点认为：“每种研究传统都对世界政治的本质有一套独特的**核心假设**。反过来，这些假设在不同的传统中又往往不相称。它们规定了不同的分析单位（个人、团体和国家），行为者的不同利益（财富、权力和地位），甚至不同的决策过程（后果逻辑与适当性逻辑）……它们体现了对世界政治的不同看法，认为世界政治本质上是冲突性的、更多是合作性的，或者是行为者自身行动的 ‘开放’产物……这些假设界定了研究的边界，什么是 "已知 "的，什么是未知的，甚至什么问题和困惑值得一问……”

2. 反对范式的理由

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有很强的交叉性和差异性，很难说有两个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共享着一致的核心假设。范式对于现实而言难有用处，对理论而言益处也很有限。

范式还强调传承，将各类理论不断向上追溯和联系。但这种联系往往对前人思想进行了简略甚至扭曲，并且也忽略了一些范式之间的重要联系。